

家族微信圈的文化传承及其性别价值

郭淑梅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8)

摘要: 悄然兴起的家族微信圈,在中国家庭中正日益发挥着重要的情感纽带作用和家族文化传递功能。以百年为考察时段发现,家族在中国经历了农业、工业、信息社会的发展阶段,建构着社会形态的基本样式,见证着人生的悲欢离合。其在培育优秀人才,以及提供家训、家教、家风等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公有制标举集体主义新风尚,单位兼具了部分家族功能,传统家族文化渐行渐远。改革开放后,家族力量得以释放。尤其近年来,由微信牵引的家族文化的重建,不仅将断裂的家族脉络重新纽结起来,而且女性在重建过程中价值凸显,借助家族微信圈平台,以个性张扬为特征的性别平等体现得尤为充分。

关键词: 家族文化变迁; 家族微信圈; 性别价值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838(2017)03-0057-06

一、家族文化变迁

家族是以姓氏为单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亲情为依托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和经济利益共同体,以维持独特的文化传承为旨归的社会基本细胞。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传统家族在中国社会的形成是以地缘为中心的血缘集合。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的大家族普遍存在于社会各个阶层。正如老舍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以宏阔的视野讲述北平沦陷时期祁家、钱家、冠家等家族的抗战与投降的曲折命运,将旧式家族的分崩离析与国家民族命运结合起来,家族在中国具有普遍的认同价值。家族曾经与家风家教的熏陶、社会责任的担当、传统技艺的接续,以及文化密码的传递直接相关,是关系到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

农业社会中,在以村为单位的社会结构中,以姓氏为核心聚集起的家族可以设祠堂、编族谱、私立族法、族规以惩治逾越者,违者甚至可遭极刑。家族族长对族人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即便在城市文化圈中形成的大家族,在地缘圈子规囿下,旧式家族的族规文化的封闭性也制造了许多人间悲剧,这在著名的“五四”作家的文学创作中都有表现。如巴金的“家”三部曲《家》《春》《秋》,写尽了大家族的没落和青年人的觉醒,代表了“五四”青年决意冲破旧式家族束缚,走上社会而获得新生的一种时代风尚。旧式家族在此被表现得没有任何存在价值,是逆流而动的腐败文化机体。青年人必须冲破牢笼,甚至砸碎家族的铁锁链,才能换来与大众一道的新生活。另一位“五四”女作家萧红在小说《呼兰河传》《家

收稿日期: 2017-03-02

作者简介: 郭淑梅(1958—),女,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女性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区域文化史研究。

族以外的人》中,把家族中有二伯卑微的下等人身份写得淋漓尽致。尽管有二伯的辈份高,但经济地位低下,是寄食于族中富有的弟弟家中的穷亲戚、乞食者。因此,农业社会的旧式家族文化经过“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被作家文人所诟病,令闻者生厌。

但是,在民间口述中,家族文化往往被赋予正面价值,得以数百年地承继。家史的口耳相传,使赞颂成为传承基调。如满族家族英雄说唱《萨大人传》^{[1][P3]}是满族说部中的“包衣乌勒本”,即家史。这部产生于清朝道光年间的家族史,主要流传于黑龙江省爱辉地区满族诸姓中。在富察氏家族、关姓、吴姓、杨姓、张姓等家族中公开传讲。一部家族史传承下来,已有二百七十多年历史,可见家族文化传承的生命力。家族史传唱的初衷,被当作“子弟书”,教育家族内部子孙对祖先产生敬意,弘扬家族精神文化。传承人富育光对《萨大人传》高度概括,认为其“是一种讲家风,述族史,唱英雄,扬国威的传承教育的虔诚、肃穆之举”^{[1][P4]},也是一种寻根问祖不忘源头的追溯家族伟人的方式。家训、家教、家风便在这种口耳相传的家史中,潜移默化、自然而然地成为训育后人的家族文化范本。另一个家族脉络传承人傅英仁的满族说部《萨布素将军》原名《老将军八十一件事》,主要流传在黑龙江省宁安市一带,傅英仁的长辈对他说“你得把这个故事弄完整了,把它记下来吧。要不然的话,在我这一代人传不下去,对不起祖宗,也对不起后代子孙”^{[2][P3]}。这部传承二百多年的家史,同样凝聚着傅氏家族对祖先黑龙江首任将军萨布素的敬重,家史的传递,目的也是颂扬其业绩和爱国精神,以训育后人。

工业文明的到来,还产生了另一种中西会通的家族文化。20世纪上半叶,西方教育、科技、生活方式冲击了中国旧式家族,西学东渐,一些有识之士有感于国运衰落,从挨打中觉醒。接受变革思想的家族,都将子女送到海外学习深造,于是“流动性”家族产生了。在此,地缘不再是家族圈核心,分散的家族势力如同移动的大树,在不

同的地方扎根、发芽、开花、结果。譬如,宋耀如宋氏家族,诞生了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宋氏三姐妹”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她们的宋氏家族文化具有独特的政治经济标识,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与国家命运紧密相关的大家族文化。

工业文明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对抗。工人作为劳动力从农村、山区、小城镇等小地方涌向灯红酒绿的大城市,建构起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有组织的工人集群。在这个庞大的社会集群中,以工资关系为纽带的资本家的权力迅速上升,成为主宰工人命运的新型权力。譬如20世纪上半叶,中东铁路的建成通车,使哈尔滨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移民城市。与中东铁路同时兴建的哈尔滨车辆厂,不仅聚集起一大批俄国工人,也吸引了大批“闯关东”的山东、河北移民。“闯关东”大潮使“关里家”^①与关外世界,隔成一个家族的两个世界。俄国工人与故乡亲人也是天各一方。思乡情绪,也就是对故乡家人、家族的思念,使哈尔滨大街飘荡着东正教教堂的钟声,也使极乐寺的香火为“闯关东”的移民提供了思乡的精神慰藉。在此,家族的影响力相对弱化,工人阶级以各种组织形式取代了家族集群,并形成了联合起来的世界性症候。为向资方争取过“五一”的国际劳动节的权利,1907年5月14日(俄历5月1日),哈尔滨车辆厂中俄工人举行大罢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工人罢工^[3]。这进一步说明,工业文明尤其是工人集群,在生存空间范围内突破了旧式家族的血缘圈围,进入了工业社会范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行全面计划经济国策。单位制度人事户口制度的严格管控,使城乡差别界限凸显。农村由于地缘关系,在一定的区域内仍然保留着以往家族群体的聚集模式,以同一姓氏或不同姓氏但有姻缘关系的家族共同体,承担着彼此关联的责任义务和家族文化传承。城市由于公有制单位的出现,家族圈子越来越小,民间往来也仅限于居住地相距不远的亲属来往。远距离的城乡之间亲戚往来,由于火车、汽

车等交通工具以及住宿的不便,而阻碍了交流。保持家族成员联系的方式,主要由通信、包裹来完成。

在单位制和社区制中,许多问题都可以由“公家”解决处理,如生育、红白喜事、子女就学、子女工作、子女上山下乡等涉及个人隐私和家族内部的事务均由个人所就职的单位来解决。生产生活等众多事务,与家族姓氏关系不大。因此家族文化往往隐退幕后,沉潜入人们的记忆深处。这一时期,由单位制和社区制的集体方式,取代了数千年流传下来的以姓氏为核心的家族方式。

二、家族文化重建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包容姿态来拥抱世界。在“全球化”“一带一路”等大文化语境下,中国与各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交流互动频繁,地理空间的阻碍,已由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逐渐缩小。在制度上,以身份证制替代户口制,为人员自由流动提供了先决条件。为获得更优质的生存条件和生活空间,许多中国人背起行囊,选择在异国他乡发展,加入流动迁徙大军,以致世界各地到处都有中国人的身影。在全国各处,人们随时都可能遇到故乡亲人。家族成员冲破地域界限,分布在国内外、省内外、市内外,天各一方。许多家族成员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团圆相聚。这种地理空间和文化阻隔的差距愈大,家族内部彼此情感需要、精神抚慰的心理需要愈强。

同时,重建家族文化,也是人类进入“地球村”时代产生的一种文化自我保护心理,是由于经济高速发展中狂拆的村落、城墙、老宅等城乡改造项目的负面效应,以及区域文化遗产等家族共同记忆消失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身份认同需要。文化之所以能够存续下来,原因之一即是文化身份的个性化,也即文化的多样性魅力。家族文化正是具有识别意义的文化身份个性,这些独特标识吸引着人们回归故园、了解故人,进而追溯家族史,使中国人重新有了家族意识和家族文化。

目前,虽然中国社会谈论“家族”这个词的

人越来越少,人们多半以家庭代替家族。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又为渴望大家族生活的人们提供了新的机会。与“80后”“90后”独生子女相比而言,中国最有资格谈论家族的一批人是“50后”“60后”人,这两个代际出生的人,所处的历史时期是中国战后的生育高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迎来了除旧布新的建设期,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不仅是经济、文化资源,也有人力。在鼓励生育、学习苏联“英雄母亲”的号召下,中国母亲也最大限度地奉献了一批宝宝,这一时期的生育高峰使中国社会家庭结构有了独特的称谓“多子女家庭”。进入信息社会,文化传承方面起主导作用的这一批人,拥有接受新事物的极大热情。他们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改革开放,是一批精力充沛永不言败的人。他们上有老,下有小,还有兄弟姐妹,一批同姓氏、同祖籍的人,比较容易形成家族圈子。作为城市家族圈里的长辈,经常会起到文化传承的主角作用。年轻的后辈则在长辈间的交流互动中,传承着家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从中汲取集体的力量。

信息社会的到来,尤其是不断更新换代的技术革命,使家族文化传承迅速进入一种虚拟社会,得以即时快速传播。早在改革开放前,人们为解决家族成员分隔两地、三地,及至国内国外的思念之苦,主要联络途径是电报、通信、邮包、长途电话等。尤其是信件、电报、包裹等实物,寄托着沉甸甸的亲情,是家族成员极为珍视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交流手段。及至出国潮、打工潮的长盛不衰,又使国内外长途电话、手机成为家族成员联系的主要纽带,这个纽带持续了30多年。

进入21世纪,智能手机因其操作简单容易,图片和视频上传的即时性等优势得以普及。微信自媒体平台广泛应用,节省了每个家庭大量的电话费支出。由于城市水泥森林的阻隔,家族微信圈以在场的方式,把碎片化的家族重新凝聚起来,使家族人员承担的家族义务得以明晰,互助互惠理念得以强化。家族微信圈形成了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小社会。其互动的主要内容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大事小情,诸如生育、红白喜事、

生病住院、子女升学工作、经商者开业、公职人员升迁、退休人员养生、小家庭集体旅游等,都可以在微信家族圈中公开亮相,以获得帮助和达成共识。《三亚日报》刊文《家族微信群:几家欢乐几家愁》谈到家族微信群带来的利弊。“32岁的阿毅在广州生活了10年,他的长辈中,奶奶和几个叔叔生活在老家琼海,父母兄弟则在海口生活,几个堂兄弟也都在不同的城市,‘家族微信群对我而言更像一个纽带,将一大家子人联系在了一起’”。^[4]网友@abc安认为,多年未见的亲戚,通过微信圈聊天也亲近起来,“既活跃了气氛,也让大家族的亲切感更浓”^[4]。当然,尽管家族微信圈是虚拟空间,但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仍然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线上线下,一些生活问题也会带入微信圈内。比如,年轻人不喜欢的催婚,在家族微信圈里也会有所表现。网友@小心翠翠认为,家族内的亲戚的逼婚让她非常烦恼,“大姨、二叔,甚至是已婚的表弟,有时聊着聊着,就会突然冒出一句‘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此话题一出,大家就开始跟着逼问,甚至张罗着介绍对象,没完没了”^[4]。对于家族微信圈催婚现象,包括各种长辈对年轻人的建议,主要是因其牵涉到亲情、家族利益,其他人才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或者说说话口无遮拦,直抒胸臆。因此,家族微信圈针对个人生活私密性的干涉,仍然是线下家族内部才会发生的事情。

毫无疑问,家族微信圈存在的利弊,均源自正常的家族成员的交往内容。是否加入家族微信圈,还拥有选择性的自由。譬如,不喜欢催婚的年轻人可以选择屏蔽,照样过自己喜欢的日子。总的来说,家族微信圈利大于弊,它通过视频、发文章图片、分享网页、收发红包、赠送祝福、讨论家务事等,既解决了家族成员的思念之苦,又密切了家族成员的亲情关系,也传递了良好的家训、家教、家风。同时,在涉及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国家大事的思考、讨论、分析、评价等表达家族成员的社会责任方面,也有其他自媒体无法取代的良性互动优势。

尤其是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国策以后,家庭人

口锐减,一些“80后”“90后”年轻人热衷于家族重建,不仅在家族二代中间建立小型微文化圈,也倾心于充当大家族的时尚教主,在大家族微信圈中发布新的时尚文化信息,成为指导前辈家族成员融入当下社会,接受社会新风尚新文化的一股新生力量。城市家族微信圈的普及,有利于凝聚家族人心,也有利于传播家族文化,成为当下家庭文化建设中重要的一环。

三、城市家族微信圈的性别价值

城市家族微信圈的兴起,是与智能手机等信息技术革命一道而来的一种家族重建热潮。从性别方面探讨,可以发现家族微信圈无形中已成为一条虚拟空间的地道,顺利地挖到了性别文化的前沿。以往,可望不可及的话语权成为家族女性唾手可得的大礼包。严格意义上讲,自媒体女性话语权,由于其普及性的特点,可以称之为一种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性别利益分红。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最先拥有话语权的是大批女作家。她们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对社会问题和重大题材的关注后,大都转向了女性题材,关注女性自身的成长过程,女性家族的命运。她们在作品中试图回溯女性生命的源头,探讨母系一脉的形成发展,希望能够获得女性自身的优秀文化资源,并努力让这种资源带给女性力量。如张洁的长篇小说《无字》^{[5] (P14)}是一部跨越四代女性生命成长的家族史诗,她将女性家族的命运镶嵌在中国社会百年风云变幻的历史画卷中,并针对“渴望被拯救”的女性姿态,清算男权中心文化对中国女性训育的成就,以一部女性为中心的母系家族史来回答血缘之爱高于男女情爱的社会性别命题。赞誉者认为其是“无韵的悲歌、无字的历史”(曾镇南);批评者认为其是“一个失败之作,一个凭借着小说的虚构权来泄私愤的文本”(徐岱)。这部受到赞誉和抨击都十分明显的小说,曾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说明其文学史地位之高。王周生的长篇小说《性别:女》^{[5] (P190)}与张洁的《无字》史诗般的叙述不同的是,前者更像是一部社会学心理学案例剖析,体现出作家把社会性别平等理念执着地转化为艺术形象的良苦

用心。其从性别角度切入家族文化史,从一个女性家族对生育和性事的厌恶,透视出女性话语权对女性家族史追溯的重要性和决定性意义。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女作家的文学语言,成为中国性别平等意义上的先锋符号。林白的《妇女闲聊录》^[5](P215-216)将这种书面语,带到女性日常生活的琐碎事件的描写里,以女性的声音记录女性的记忆和感受,是一种口述实录的写作方式,接近于微信圈中的碎片化、断裂式表述。李小江认为,口述对女性生命立场是极为重要的,是“找回和重建女人的历史,不仅是史学的需要,更是女人找回自我,确立自主、自信的人生的必要基石”^[6]。李小江的女性口述对于重建女性文化必要性的论断,是拥有知识储备和大量理论积淀的女知识分子对女性史建构的理性思考。

综上考察的女作家作品案例,其所体现的是作为拥有话语权的知识女性,在女性家族史的建构中所起到的重要支撑作用,以及她们对女性史、女性家族史的贡献。作为女性群体中的少数精英人物,她们所拥有的话语权无论是在批判传统男权中心文化方面,还是在建构女性自尊自信等方面,都为历史留下了可圈可点的业绩。

遗憾的是,以往大多数非知识女性,对话语权的掌握与运用的机会并不多,她们的话题权充满局限性,使其无法与女作家性别话语立场的先锋性和理论价值相提并论。然而,女性对话语权的渴望一直存在,对个人能力的展示欲望一直存在,这在各种类型的女性口述史中都有明确的表现。微信圈作为一种自媒体平台,恰恰可以提供给男女平等的话语权,这对于渴望表达的女性来说,是个极好的机遇。

家族微信圈由于话语权的自由平等而发展速度迅猛。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享有信息发布权和话语权。由于是虚拟平台,彼此不相对视,仅是语言符号交流,性别在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突破面对面的正式交往带来的严肃性,从而自由流畅地进行彼此交流。这种平台功能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分享。在这一功能下,家族成员发布各种信息、新闻都是

互相增进感情的手段。赞美往往可以使人变得年轻而有活力。家族人员之间的互相点赞,对某些家族成员精彩人生的褒扬,不仅可以加深彼此感情,还会成为一种动力,推促其向更好的方面成长。二是给予。无论是发布信息,还是广告话语,抑或展示自家照片等,都需要家族圈成员率先给予支持。不仅是年节时发的微信红包,可以让家族人员得到给予的幸福感,就连平时的点赞也可以让人被满足感包围。三是互助。生活中,家族成员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难处,每当这时,家族微信圈如同一个调度室,可以迅速地聚集起力量,就连需要资金、医药等应急问题,都有可能通过家族微信圈得到解决。

家族微信圈由于没有入门坎,操作极为简单,语言表达也任由个人掌握,为性别平等搭建了以往无法比拟的自主平台。首先,网络语言与生俱来的嘻哈风格和口语化,使女性比男性运用得更加自如,一些搞笑的片断式的吐槽语言冲击了代表主流正统风格的男性话语。女性在微信圈里,自由舒展地发挥着聪明智慧。有位84岁的老太太在家族微信群“一家亲”里搞笑,“微信玩得与时俱进,发过的表情包就有二三十种。今年春节,这位老太发了一封配音乐的贺年信,引来众人点赞。……不懂网络语言,却爱插话,吐槽。商场搞促销‘秒杀’,她说‘干吗老是杀杀的,疼得慌’。”^[7]这种捣蛋式的表述,正是女性文化的风格。其次,微信家族平台与生俱来的熟悉感和抱团意识,使家族女性成员更愿意真实地地表露个人行踪、意图,由此催生了共同的兴趣爱好。旅游、健身、休闲、养生、美食、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等信息均可在此平台发布。相对于家族男性,微信自媒体更多地是女性展示和获得自信的重要途径。女性更依赖这个社交平台,以获得精神认同。再次,在家族微信圈,长辈女性拥有更大的权力。中国女性由于养育了儿女还要养育孙辈这一特殊的社会分工,她们一般在家族中地位甚高,拥有话语权。她们不仅在微信圈里表达对孩子们的关爱,在圈里唠叨些家族琐事,还有掌控家族文化遗产的力量。“老太太

太把微信圈看作是家族成员互相学习、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净化心灵、传播真善美等正能量的平台。”“圈里有人转发了一个关于男人包养小三小四的段子,虽然只是逗逗乐,余老太太却认为有伤大雅,不符合微信圈的舆论导向,因而勒令其立即删除。”^[8]

因此,就家族微信圈来说,以女性比男性更为频繁地发布信息、坚持嘻哈话语风格、表现强烈的展示欲望以及鲜明的主张家族正能量的传播等特点,说明以个性张扬为特征的家族微信圈平台,是一个性别平等体现得最为充分的平台,也是一个最能体现女性自身价值地位的平台。

注释:

① 关里家 指移民到哈尔滨的山东人对家乡的称谓。

参考文献:

- [1] 富育光,于敏.萨大人传[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 [2] 傅英仁,程迅,王宏刚.萨布素将军传[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10.
- [3] 张翔.常好礼.黑龙江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3.
- [4] 梁丽春.家族微信群:几家欢乐几家愁[N].三亚日报,2016-02-24.
- [5] 郭淑梅.女性文学景观与文本批评[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3.
- [6] 李小江.让女人自己说话:文化寻踪[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7.
- [7] 何泉.老人玩微信,有喜也有忧[J].新天地,2016,(9):18.
- [8] 刘静一.“余太君”坐镇家族微信圈[J].新天地,2016,(9):17-18.

The Value of Family WeChat Group in Cultural Inheritance

GUO Shu-mei

(Heilongjiang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aerbin 150018, China)

Abstract: Family WeChat group, quietly emerged in recent years, is becoming a significant emotional connection and bridge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in today's Chinese families. Over the last century, family has gone through different stages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and informational periods, functioned as the basic unit of society and witnessed ups and downs of its members. Nothing could replace the family's function in cultivation, disciplining and styling Chinese people.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PRC, work unit took part of the family's function under the call of socialist collectivism, causing the withering of traditional family culture. After the opening-up and reform, family was functioning again. Up to recent years, the reconstruction of family culture enabled by WeChat not only reunited the scattered family members but foregrounded the status of women. On the platform of family WeChat group, gender equality and individuality have never been more significantly reached.

Key words: transition of family culture; family WeChat group; gender value

(责任编辑 赵莉萍)